

浙江首次公布全省石窟造像档案 这些藏在山水间的国宝你了解吗？

近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编著的《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出版上市。这是浙江首部对省内石窟造像全面、详细记录的“身份档案”，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材料支撑，更是首次面向社会公布，让历史文化爱好者得以全面领略浙江石窟造像的魅力。

这本《报告》背后，凝聚了浙江文物保护工作者与民间爱好者们共同的心血。他们通过多年的寻访与研究，将浙江87处共2485尊造像一一“摸遍”，其中许多重要发现，或将重塑浙江石窟造像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



飞来峰造像中大肚弥勒和十八罗汉像

浙江石窟有不少“中国之最”

“浙江石窟造像一半以上在杭州，精华也在杭州，就在西湖周边。”《报告》的编撰者之一，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介绍，开窟造像，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通常在皇家或官方的支持下才能办成。杭州作为吴越国、南宋都城，是浙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石窟造像最多，也最为精美。

“吴越国当时被称为‘东南佛国’，历史记载有近500座寺院。但我们现在能看到实物的只有这10处石窟造像，历史价值不言而喻。”魏祝挺说。

在这本《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浙江石窟中的“中国之最”——

绍兴新昌大佛寺的弥勒大佛，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南朝造像，紧邻的千佛岩造像是迄今为止南方发现的雕凿年代最早的石窟造像。在那个石窟造像刚刚在中国出现的年代，浙江已经紧跟上了“流行”的步伐；

飞来峰是浙江省石窟造像最集中的区域，同时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元代石窟造像群。飞来峰大腹便便、憨态可掬的布袋弥勒造像，后来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标准弥勒形象；

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造像分别在石龙院、烟霞洞和石屋洞，都在杭州西湖边。

有趣的是，飞来峰中的元代高僧取经像，已经呈现出了唐玄奘、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形象，这比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早了几百年。

《报告》还对杭州之外的石窟造像进行了首次集中披露。其中宁波5处、温州7处、绍兴9处、湖州2处、金华3处、衢州2处、台州11处、舟山3处。

“这次调查，是对浙江省石窟造像资源的第一次整体巡礼和全面报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介绍，不论是杭州的多处重要发现，还是对杭州以外地区石窟造像的全方位记录，都为浙江石窟造像的研究与传播提供了全面、可靠的基础材料。

十六罗汉还是十八罗汉？

《报告》的编撰者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主任崔彪介绍，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组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带头，各市县文博机构的工作人员、浙江大学的数字化采集团队等共同组成，四个小组分别负责调查杭州、温台嘉、金衢丽湖、绍甬舟片区。

“我们一般都在冬天进行野外调查。”杭州地区调查小组的魏祝挺说，这样可以避免蚊虫、高温的困扰。如果在夏天探索深山中溶洞中的石刻遗迹，还会和洞中黑压压的蝙蝠“打照面”，但在冬天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除了记录本、尺子、强光手电，我们还要带上无人机、扫描仪、测绘工具等专业设备。”崔彪说，到了石窟造像面前，调查人员一寸寸地“摸山读石”，或许才能找到前人未曾发现的“隐藏款”。

调查期间，魏祝挺和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黎毓馨一同来到烟霞洞，记录内部的吴越国佛教造像情况。如今洞内的造像，保留下来的有十尊，三尊是明代复建，还有一尊门口的弥勒佛是1979年重塑的。

在这些人工雕琢的石头上，有一个争论了百年的谜题：它们究竟是“十六罗汉”还是“十八罗汉”？

从唐代开始，玄奘取经带回《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记录着“十六罗汉”，因此“十六罗汉”在当时特别兴盛。但到了宋代，苏轼笔下记录的已是“十八罗汉”。至今，中国人提的都是“十八罗汉”的概念。

可以肯定的是，“十八罗汉”是中国人创造的，但究竟从什么朝代开始出现，从哪里起源，一直没有可靠依据。

魏祝挺和黎毓馨走在阴暗的山洞里，冬季的石壁很干燥，没有水的反光，黎毓馨打开强光手电筒从侧面看去，随意一瞥居然看到了非常明显的刻字，仔细再看，居然有八处从未发现过的吴越时期造像题记！

后来，魏祝挺和其他调查队员又来洞里勘察了不下十次，和现有的文献史料反复核对，最终确认烟霞洞内确有十八尊罗汉，并且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实例。可以说，“十八罗汉”的起源，就在烟霞洞，就在吴越国时期。

“这次调查，建立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崔彪介绍，在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完成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各地文物部门又陆续掌握了十几处新发现的石窟造像线索，借这次专项调查的机会，对这些新发现进行了登记和公布，将其纳入了文物保护的工作体系。

“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石窟造像，体现了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巅峰成就，为佛教艺术史提供了十六罗汉、十八罗汉、白衣观音、布袋弥勒等新题材。可以说，浙江是我国南方唐代以后石窟造像分布的中心，见证了中国石窟史最后的高峰。”魏祝挺认为，杭州石窟造像，特别是吴越国时期石窟造像的学术地位应当得到提升，它们对宋元时期的造像，乃至后来东亚地区造像、泥塑、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影响都很大，值得进一步研究。

科技按下岁月“暂停键”

学者们在山水间记录、研究历史，游客们则行走在山水中，感受古今对话的意趣。

“让更多人了解石窟造像，理解它的文化内涵，要将石窟造像与当地历史文化、民俗信仰进行深度链接。”《报告》的编撰者之一，浙江大学艺



术与考古学院助理研究员陈晶鑫认为，比如台州黄岩的佛岭姑娘造像，可能从艺术性上来说并没有很精美，也没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来自于民间传说的她，就是我们了解当地历史文化，与城市产生认同感的一座桥梁。

见证千年历史更迭的石窟造像们也在慢慢“老去”，如何让它们“驻颜”，是目前文物保护工作者正在研究的课题。

“浙江的石窟造像，很多都开凿在石灰岩上。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流水会逐渐侵蚀造像的纹路样貌。另外，山林中植物茂盛，强大的根系也会让石窟造像开裂、崩坏。”杭州西湖风景名胜景区隐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邵群介绍，多年来，飞来峰造像已经前后实施了三期保护工程，基本解决了90%以上的造像面流水问题和70%以上的渗透水问题。目前，飞来峰造像即将开启第四期保护工程，将对飞来峰山石间的渗水问题进行研究处理。

而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二楼展厅内，石窟造像以另一种方式按下了岁月的“暂停键”：一尊嵌在墙上的烟霞洞白衣观音造像复制品，看起来与真品并无二致，就像刚刚从洞里搬过来的一样。

这尊造像是利用浙江大学的石质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复原而成的复制品。“我们跟随这次调查工作，把浙江所有的石窟造像都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建立了一份数字化档案。”陈晶鑫告诉潮新闻，数字化技术，比传统的照片、测绘信息更加准确、精细，可随时还原造像的原真面貌，纤毫毕现。

邵群相信，让石窟造像留存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更多人了解它们，爱上它们。

斯石不朽，兹山永固。古人开山造像，誓将信仰刻进山川石崖，流传后世。如今，这些“摸山读石”的人们，用脚步，用笔触，用科技，再度让历史文化永存。

据潮新闻